

秭归县屈原文化研究会
秭归县移民局

屈原文化

2008



上下求索
振興邦國
百世流芳

二〇〇八·十二·廿六

目 录

屈原文化的探索者.....	李华章 (1)
一读屈原一肃然.....	李华章 (5)
口头的,也是心中的.....	李华章 (8)
汤炳正先生与《楚辞》研究.....	汤序波 孟 骞 (11)
屈原时代:楚与齐之文化交流.....	黄崇浩 (19)
韩国端午节及其它.....	王作栋 (27)
当代骚坛诗人的文化人格.....	吴卫华 黄 丹 (38)
楚美术色彩观.....	王祖龙 (48)
用文学形象丰富屈原生平.....	王健强 (55)
屈原精神的现实意义.....	郑家奎 (63)
秭归“丹阳城”在哪里?	袁子信 (75)
与日月兮齐光.....	谭家斌 (82)
屈原生于秭归乐平里新证.....	谭家斌 (90)
夏明翰与屈原精神.....	郑承志 (95)
屈原贾生的同中之异.....	周志德 (103)
舍末逐本话清高.....	郑学智 (108)
中华民族刚健品格的先行者.....	郑学智 (116)
《楚辞》与南方酒文化.....	陈国新 (125)
乐平里庙会纪略.....	谭家荣 陈国新 (133)
屈原故里秭归为何有红棺葬习俗.....	黄 丹 (136)
附:颂屈原诗选录.....	(144)

屈原文化的探索者

李华章

在他乡工作拼打的人，对于故乡总是怀有一种深挚而厚重的眷恋，谁没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呢！我常常为怀化溆浦家乡的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才辈出而梦绕魂牵、炫耀欣喜。溆浦是人文底蕴深厚的一片热土。在近现代史上曾涌现出“妇女领袖”向警予、《辞海》主编舒新城、敦煌历史学家向达、新华社第一任社长向仲华等等名人大家，其丰功伟业光耀史册。

近几年，从事屈原文化研究的禹经安，以其学术论文和专著《屈原在溆浦》（中央文史出版社 2007 年出版）而显露头角且颇有锋芒。五年中我三次回溆浦，每次都见到了禹经安先生，缘分不浅。记得头一次，他当时在县旅游局帮助工作，带团队游览溆浦的灵秀风光、山川名胜，特意把我捎带上。一路上，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倾听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溆浦的遗迹和传说，口齿流利，仿如悬河，方言口音加普通话，倍感亲切。对他的学术和热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从 1978 年以来，担任县文物专干，曾步行数百里，走访上百家，广泛搜集有关屈原在溆浦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全心全意地工作着。有一回，在马田坪茅坪村，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被他感动了，热情地带他到“招屈亭”去寻一块“屈原故庐”石碑，不顾高龄，亲自下到“千工坝”的渠水中，指出那块石碑在修堤时，被人抬到这里，埋在堤脚下。溆浦“招屈亭”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纪念屈原的建筑，

据考证，建亭时间约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9 年）。亭子位于溱水畔的茅坪坳上，距县城仅四公里。历代留下了许多抒写“招屈亭”的诗词，记载在《溱浦县志》、《辰州县志》和《湖南省志》；但毁于何时？县志里没有明确记载。

2005 年金秋十月，在溱浦一中部分老同学一次聚会中，他应邀在会上向我们热情地介绍：“溱浦是屈原放逐江南的定居地，也是屈原的第二故乡。”大家颇为此而骄傲自豪。经考证，屈原在溱浦不是短暂逗留的过路客，而是“生活了八、九年之久。他的足迹踏遍了溱浦的山山水水……他在和当地百姓长期相处中，懂得许多溱浦的地方方言，民间风俗……这对屈原的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溱浦古八景”中，屈原独占了二景。今天，我们重温《楚辞》，那古风古韵在溱浦还能找到它的源头。正如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先生所说，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溱浦考察时，“进入溱浦地域，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仿佛时时都能看到屈原彷徨行吟的伟大身影”。

沈从文先生曾写道：“战国时候被放逐的楚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灵洞，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可以发现。《楚辞》中的山鬼、云山君，仿佛如在眼前。”

上世纪 70 年代末，禹经安曾在省考古大队协助熊传霖（原湖南省博物馆长，研究员）先生工作。他的学历虽不高，但他几十年自学成材。从省考古队回溱浦后，仍旧任文物专干。在文物普查时，他搜集了许多如“招屈亭”、“鹿鸣山”、“明月洞”等有关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心中萌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溱浦是屈原的流放地，可屈原研究中还从未看到过有关溱浦方面的文章。自己应该在这方面开个头，可不可以由自己来填补这个“研究空白”呢？他的大胆设想，得到了有的专家学者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于是，他就努力阅读前人的研究资料与成果，在广泛阅读中独立思考。终于，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涉江》“入溁浦……”的注释中，发现学者们，包括郭沫若先生都把溁浦认定为荒僻的“非人之境”。既然如此，溁浦就被屈学界所忽略，研究的兴趣全无，学术视野扫不到这个地方。这就留下了屈原流放溁浦这一段重要的研究空白。

禹经安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后，就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探索课题。他长期从事过研究溁浦地方史，著有《溁浦拾轶》一书；而且掌握了溁浦出土文物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具有权威性的科学资料。于是，他利用到外地出差机会，留心有关资料图书，只要与屈原研究方面有关的，见到就买，听见就去索求。经过多年积累，勤奋读书，认真思考，大胆探索，学有所成。说起购书，由于他工资低，家庭负担重，不得不买些廉价的“盗版书”。有一次，著名作家、老乡王跃文还当面批评他不重视《版权法》。他苦笑地点头接受。但他那心中的苦水往何处去吐去倒呢？奈何！人生要干成功一件事，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他从不灰心丧气，君子固穷，却志不穷，一股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支撑着他，催促着他。现在想来，还颇发人深省！

终于，禹经安利用已掌握的各种资料，结合溁浦的地理状况，写出了屈学研究论文《评屈原流放地溁浦“非人之境”说——楚辞研究中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它以充足的理由，阐述了战国末期的溁浦，不仅不是学者们所说的“非人之境”，而是一个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战事不断的楚南邑重地。因此，西汉初才把管辖沅水、澧水两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武陵郡治设在溁浦。他带着这篇论文去参加湖南省屈原学会成立大会，并成为第一批省屈原学会会员。学术界往往在某个领域中一旦有所突破，就会开创研究的一个新局面，填补一项“空白”，其学术成

就是不可低估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2007年的金秋，在“中国·溆浦首届屈原文化节暨屈原理论研究会”上，来自全国各地60多位屈原研究专家教授，提交有关屈原入溆浦的论文多达10多篇。比如，云南大学殷光熹先生的《屈原“入溆浦”的前后经历和心声》、中国政法大学黄震云先生的《溆浦和〈九歌〉的写作》、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刘伟生先生的《〈涉江〉“溆浦”研究评议》、衡阳师院雷庆翼先生的《屈原与溆浦》、唐振华先生的《屈原的最后九年在溆浦度过》等，真是一花引来百花开！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禹经安多年探索屈原文化之功劳。他的勇于探索，执著追求，发愤努力，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和奉献品格，是值得称赞的。他现在担任中国屈原学会理事。禹经安先生一辈子从事文物考古与屈原研究，且卓有成绩。到头来，仍然是个“以工代干”的身份。我听后心中陡生不平。也许是某些制度所造成的不公平公正的弊端吧？！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语言学院教授方铭，在《屈原在溆浦》《序》中称：“……所有这一切，不仅让我们对于屈原与溆浦关系的认识，而且提供溆浦的有关屈原及战国秦汉的历史资料，为广大屈原及楚辞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资料宝库，这无论如何，都是我们所应该感谢的，当然，也是我们应该尊敬的。”熊传薪先生热情地肯定了禹经安的研究成果，“这是他的一种新思维”；“他的文稿言之有理，论之有据，有新的见解和独创之处，对研究屈原文化大有益处……”

岁月无情，人事沧桑。尽管禹经安先生人生艰难坎坷，但他用毕生精力和心血凝成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学者同行们的认可和钦佩，应当没有辜负自己的一生，幸哉！

一读屈原一肃然

李华章

我们起心编著《屈原诗歌释读》这本书,是别有一番因缘的。屈原于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 340 年)正月初七,诞生在秭归乐平里(今宜昌秭归县)。在屈原故里,我们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总是以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而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屈原的高尚品格浸透着我们的血液,屈原的光辉诗篇照亮了我们的心胸。我们崇敬屈原,缅怀诗人,对他怀有一份特殊的浓烈的乡情与乡恋。为了更加普及屈原的诗歌,帮助广大青少年读懂那一首首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诗篇,便点燃了我们编著此书的热情,也平添一种责任感。

“楚辞”是楚国人创造的一种新诗体,亦称骚体。它是以屈原为代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诗歌。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刘向曾编辑一部《楚辞》,凡 16 卷。这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经过屈原的天才创作,使楚地之“辞”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代诗歌成就的光辉代表和典范。可惜的是,刘向编定的 16 卷本《楚辞》,早已佚亡。后世见到的最古《楚辞》版本,为东汉著名学者王逸的注本《楚辞章句》。它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也包括西汉人模仿屈、宋的作品。我们从《楚辞》中专门选出屈原的全部作品,编成这本《屈原诗歌释读》,似属当今书海中所罕见。

“楚辞”中的作品哪些是屈原所作?从古至今,说法不一,互有异同。班固《汉书·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之记载,但没有

具体篇目。王逸《楚辞章句》云：屈原作品有二十六篇。即增加了《大招》一篇。但他对《大招》又持怀疑态度，到底是屈原所作呢，还是景差所作？模棱两可。宋代朱熹《楚辞集注》认为，屈原作品是二十五篇。其中，《大招》系景差所作。其余篇目与王逸之说相同。在当代楚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同：《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卜居》、《渔父》共25篇为屈原所作。亦有学者认为是27篇的。诚然，有些见识也一言难尽。学术的魅力，在于严谨与准确。但要真正做到，自非容易之事。

屈原的诗歌，充满了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国优秀古典作家诗人的传统精神，屈原就是这个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楚国人，与楚国休戚相关，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百姓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为楚国的强盛而兴奋，也为楚国的衰败而悲伤，他愿意把生命贡献给楚国，他向往君主的贤明，并竭尽忠诚。屈原的爱憎鲜明。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溢着特别浓烈的楚国情怀，所抒发的忧愤之情非常深广，感人肺腑，动人心魄！品读屈原诗歌，令人倾心折服，叹为观止！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突破了《诗经》的四言诗体的形式，而以六言句式为主。其句法已不是平常说话的语式，而是音乐形态下歌唱的句法，富有楚声、楚乐的节奏和韵味。比如，出现在屈原诗中的一句开头，常有“羌”、“謇”、“纷”等发语词和楚地方言；常用于句中的“兮”，起着不可或缺的舒缓节奏、凝重语气的作用；用于句尾的“些”、“只”等，用以表达失意忧伤的“谗僚”，以及表示君王的“灵修”、“荃”等等。每首诗结尾部分的“乱”辞，即尾声，也是乐曲的结束曲。此外，还有“少歌”和“倡”，既有小声低吟，又有大声歌唱。因此，屈原诗歌具有音乐一般的艺术魅力。

《离骚》和其他诗篇，大量采用比兴手法。比如，用各种香

木、芳草比喻美人，以倾吐心灵的声音；用许多神话传说，尤其是昆仑山神话传说，来展示其精神的追求，驰情入幻。这样，既丰富了诗的艺术想象力，又张扬其浪漫主义精神，构成屈原诗特有的雄奇瑰丽之特色。读后往往令人惊叹不绝！

屈原的诗歌，没有写出来的远比已写出的要多。它是诗人高尚人格的折光，也是他美丽灵魂的旗帜。她好像灿烂的星月在黑夜中照耀着世代人民。伟大的诗人屈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屈原诗歌释读》吸收了古今注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在纵横比较中，取其所长，舍其所短，择善而从之。虽不敢夸为“后来居上”，但其中也许不乏一些新意。本书立足于普及性，以求雅俗共赏。一己之见，往往是有限的。好在这本书的编著是靠集体的智慧，我们五双眼睛聚焦在一处，自然多一份穿透力。

口头的,也是心中的

李华章

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故里在宜昌秭归。这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有关屈原的传说故事。千百年来,流传在秭归黎民百姓的口头上。已搜集整理出的屈原传说故事,有的发表在《布谷鸟》、《民间文学》等多种杂志;有的选入《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有的选入全国民间故事传说选本。

当我们读着这些屈原传说故事时,便沉浸在思想和艺术美的无比激动之中。她形象地揭示出伟大的诗人爱人民,伟大的人民爱诗人的鲜明主题思想。屈原一直活在屈乡人民群众的心中,就像那嘴巴殷红、羽毛金绿的鸟雀儿,在秭归的崇山峻岭、在西陵峡的山崖深谷中,从黄昏到黎明不停地啼鸣:“我哥回!我哥回……”

屈原传说故事,从不同的侧面热情歌颂屈原,抒发黎民百姓对诗人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的炽热感情,至今仍扣动着读者的心弦。正如叶剑英同志所咏唱的那样,“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过屈原故里》七律)。诗中的“行廉志洁”,高度概括了屈原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比如,我蹲在“照面井”边,那泉水碧绿清亮,映照出人的脸面,让人想起少年屈原喜欢对着井水,既照面又照心的情景,他从小就有志气,不仅懂得要讲究外貌的清洁,还要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丽。传说这口井,好人愈照愈美,坏人越照越丑。无疑,它寄托了黎民百姓的一种意愿和

理想，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和现实意义，使人自觉地照一照镜子，“吾日三省其身”，让心灵变得更加清纯、高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想人民之所想，恨人民之所恨。《纱帽垛子》的传说，就生动地记叙了屈原深入了解民情，抚恤人民疾苦，关注治国为民的动人事迹。对于奸臣害民的罪恶行径，他常气得怒发冲冠，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为民请命，努力造福人民。重建归州城时，他规划把城墙修成“纱帽垛子”。当地百姓无不赞颂。我们凝望城墙的“纱帽垛子”，就好像看见了屈原的“切云冠”，端庄地放在归州连绵起伏的城头，“冠切云之崔嵬”，寄寓了屈乡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怀念的深情。《神鱼》和《我哥回》的传说故事，从另一侧面烘托出屈原深受人民群众的热爱，对于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广大人民哀思不绝，悲痛之极。传说屈原的尸体由一条神鱼驮着，溯长江而上，穿西陵峡，过鬼门关，回游到归州城东的江面。两岸百姓无不痛哭，为了世代代祭祀屈原，缅怀屈子，在江岸山上修建了一座“屈原庙”。秭归境内，前前后后，修建了四座祠庙。《归州志》记载：“屈清烈公庙，旧名屈原祠，在州东五里屈公沱”，庙旁建“衣冠墓”。因此，郭沫若诗云：“秭归胜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流香。……”（《过西陵峡》）《香炉坪》的传说故事也很优美动人，记叙了屈原降生的情景。当时，屋顶上的天空飘来一朵洁白的祥云，接着，产房中散发出一阵浓郁的异香，屋前的地坪状似月牙形。后来，屈乡人民把它叫做“香炉坪”。

屈原从小到做官，被流放，直至投江自尽。短短的一生，是廉行志洁的一生，高风亮节的一生，热爱楚国、关注人民的一生。他的高尚情操，他的文人品格，是留给后世价值连城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屈原的传说故事，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泥土生活气息，真实可信，情真意切；传说神奇，故事优美，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语言朴实，生动自然，容易流传。它既流传在百姓的口头上，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屈原的崇高品格和灿烂诗篇，可与日月同辉，永放光芒！

汤炳正先生与《楚辞》研究

汤序波 孟 騫

汤炳正（1910—1998）先生，字景麟，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人。少年时代，在父亲和塾师的指导下，他博览传统文化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窥。1931年初春，游学于北平，攻读新闻专业。学习之余，拜谒了一些心仪已久的前辈学者如王树楠、汪荣宝、余嘉锡等，问学听讲，造诣渐深。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深受导师王文彬先生的赞誉，并被推荐到当时国内惟一的新闻理论期刊《报学季刊》上发表。1935年，他南下苏州，考入章太炎先生任主讲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其答卷“自述治学之经过”，被太炎先生摘要以《〈法言〉汪注补正》为题刊发于《制言》杂志上（还写了一百五十七个字的“批语”）。老先生第一次在府邸召见新生，待他们鱼贯而入时，朗声问道：“汤炳正来了没有？”接着就挥手将汤呼至客厅中间一张小圆桌边，师弟对面而坐。“先生怕我听不懂他的浙语，呼人取纸笔，边写边讲，将近一个小时，兴犹未尽。”后来又多次对友人说：“山东自古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就是应当出这样的人材”，并嘉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学术界或向老先生询此话的含义，始知他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门下的高足孔广森赞许这位弟子。受如此青睐，据说在当时学界就传言纷纷。以至四十年后，饶宗颐诸人在武汉遇到汤先生时，饶的一位学生还上前问他是否与章氏有戚谊关系。1936年6月14日，太炎先生不幸病故，汤先生被治丧委员会推举为弟

子的代表在追悼会上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稿后经《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手，发表在该报 19 日的上海版上。之后他即应聘担任讲习会“预备班”的教席，负责教授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太炎先生对他影响是全方位的，老先生不仅学问大，而且人品正。其《遗嘱》强调：“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在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汤先生对弟子也一再要求“先器识而后文艺”。

抗战爆发，汤先生先是蛰居乡井，后又转徙流寓西南各高校执教。1946 年 2 月，由川入黔就聘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1947 年 8 月被国立贵州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又兼任贵阳师院教授。1949 年 8 月他应著名墨学家伍非百之召，返川就聘川北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 年以后，一直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六十年间，汤先生历稽载籍，覃思精研，在屈原以及楚辞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厥功甚伟。专著《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等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不少论断曾为海内外学人所广泛称道与征引。他本人也被同行誉为“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

汤先生虽系太炎先生的嫡传弟子，但其治学并不存门户之见。在学术研究中，他既主“发明之学”，即对旧材料的重视胜过新材料；又不废“发现之学”，即对新材料的重视胜过旧材料。他的《〈楚辞〉成书之探索》等，堪称“发明之学”的典范；而《从屈赋看古代神话之演变》等，则是其“发现之学”的杰作。继承、通变、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在不断地探索着自己前进的道路。

关于汤先生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新”与“真”的认识问题。这是他晚年经常强调的问题之一。他曾一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创新，如果陈陈相因，原地踏步，学术就永远不会有

进步。但求“新”并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他看来，所谓的“真”是指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客观规律。他多次对学生说，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对探索历史的本来面貌，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说：“一个人做学问，要能在人类真理的长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我认为这里说的“本来面貌”、“真理的长河”，就是做学问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旨归；舍此，学术研究还有何意义？

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除了“勤奋”外，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汤先生的治学方法，学术界多已言之。诸如有人说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物与旧典籍互相印证进行考释；有人说他长于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研究；有人说他擅于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等等。这里不准备多谈，只讲他在学术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互相结合之妙。他认为“脱离微观的宏观研究，则宏观必陷于空泛无据，忽视宏观的微观分析，则微观必失之烦琐无根”。因此他的论著，不但注重文字训诂的考释，也十分善于阐述微言大义，可谓兼具“汉学”与“宋学”之长。他的学术论著往往是在文字训诂上胜义迭出，妙语连珠，同时又注意探索规律揭示真理，而前者总是作为后者的突破口。如他在探讨《楚辞》与《山海经》中神话演变的历史轨迹时，发现并揭示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规律。这个极富理论意识的论断，被学术界视为神话演变历史的主要规律之一，而为一些学者所广泛接受与运用。

汤先生在治学态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谨严的学风与勇于探索的精神。作为一名学者当然都必须具备这两种学术态度；但是，我发现这二者在他身上却体现的异常显著。其论著真可以说是为青年学子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他的《语言之起源》和《楚辞类稿》中的一些论文的结尾，常常出现一篇或长或短的《附记》。从

表面上看，这些“附记”与前面的论述似有不同，实质上他是在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和挖掘。在他整个学术研究中，给人最突出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从不能满足已有成绩的积极进取精神。例如，他的名山之作《屈赋新探》1984年出版后，即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就是这么一部大家交口称赞的书，出版后他仍然不断修补，在“自存本”上增写了不少新的发现和发明，预备在将来再版时加进去。他曾引用古人说的“例不十，法不立”来说明学术研究要重视论据；而他的每个论点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论据上，因而牢不可破。我深深地感到“谨严”和“探索”的学术态度、学术精神，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良工不示人以璞”。对学术论著，他一贯强调“少而精”，反对粗制滥造，务广而荒。因此，他生平虽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却“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尝说：“对学术上的创见，最好能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故我自己的心得，凡能以札记表达者，决不拉成长篇论文；凡能以论文阐述者，决不铺陈为洋洋洒洒的专著。”我认为这一点颇似他的同门前辈黄季刚先生。

此外，他数十年来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他曾对学生讲：“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八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这是他对后学的殷切要求，也是他的夫子自道。甘于寂寞、惯坐冷板凳、吃冷猪肉，正是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凡是认识汤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似乎有些“孤僻”，不愿与人交往，更从来不搞什么“应酬”活动。是文化界的苦行僧，不是学术界的交际家。而且他对晚近学术界纵横捭阖的不正之风，尤为深恶痛绝。我想，这并非什么故作“清高”，而正是一个大学者对文化事业专心致志、心不旁骛、惜时如金、不暇他顾的高度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具体表现。

汤先生以楚辞学名世或惊世。从“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他